

新古典现实主义的进展与困境

——评《新古典现实主义、国家和外交政策》

刘若楠

内容提要 新古典现实主义是对古典现实主义和结构现实主义加以反思和综合而形成的对外政策理论。《新古典现实主义、国家和外交政策》一书以“国家”为核心概念,探讨了国家的内在属性和特征为何、如何以及在何种条件下渗透到领导人对外部威胁和机遇的评估中,从而影响他们可能采取的外交、军事和对外经济政策。该书系统阐述和评估了新古典现实主义的理论主张,有助于我们深入了解国家如何评估和应对国际和国内层次的安全威胁,充分理解新古典现实主义与其他理论流派之间的区别。

关键词 新古典现实主义 结构压力 国内因素 外交政策

1998年,吉登·罗斯(Gideon Rose)在《世界政治》期刊发表一篇书评文章,最早提出“新古典现实主义”这一概念。罗斯在这篇文章中主要评述了代表新古典现实主义研究路径的5本著作,其中包括扎卡里亚(Fareed Zakaria)、施韦勒(Randall L. Schweller)、柯庆生(Thomas J. Christensen)、沃尔福思

《国际政治科学》2010/2(总第22期)第135—146页。

Quarterly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William Wohlforth) 等学者的四本专著和布朗(Michael Brown) 主编的一本文集。^① 罗斯的文章既展现了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以前新古典现实主义的开拓性成果,也为这一新兴理论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方向。在此后的 10 多年间,新古典现实主义成为现实主义阵营内部最为活跃、最具影响的理论分支,激发了大批学者的研究兴趣。2009 年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斯蒂芬·洛贝尔(Steven E. Lobell)、诺林·里普斯曼(Norrin M. Ripsman)、杰弗里·托利弗(Jeffrey W. Taliaferro) 等人主编的《新古典现实主义、国家与外交政策》(下文简称《文集》)一书,^②汇集了新古典现实主义学者的最新研究,对这一理论的核心主张作了系统阐述和评估,集中展示了这一理论的最新进展。

一、新古典现实主义的基本主张

新古典现实主义是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现实主义理论内部兴起的重要分支。与强调国际结构作用的新现实主义相对,这一理论主张将国际体系和国内政治结合起来,分析国家内部结构如何对外在威胁和机遇进行过滤,国家领导人如何评估威胁、制定战略、动员社会资源以支持这些战略,以建立一种解释国家行为的外交政策理论。^③

这一现实主义理论分支的兴起源于对古典现实主义和结构现实主义的反思与综合,在扬弃的基础上进行理论创新。结构现实主义擅长于解释国际政治结果,但因其过于宏观和抽象而难以解释具体的国家行为,古典现实主义则忽视了国际体系的主要因果作用,也不符合严格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要求,使其难以适应当代国际关系理论发展的需要。

^① Gideon Rose, "Neoclassical Realism and Theories of Foreign Policy," *World Politics*, Vol. 51, No. 1, 1998, pp. 144-172.

^② Steven E. Lobell, Norrin M. Ripsman and Jeffrey W. Taliaferro, eds., *Neoclassical Realism, the State, and Foreign Polic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9).

^③ 近来中国学者对这一理论发表了许多相关评介,可参见刘丰《新古典现实主义的发展及前景》,《国际政治科学》2007 年第 3 期,第 155—168 页;宋伟《从国际政治理论到外交政策理论:比较防御性现实主义与新古典现实主义》,《外交评论》2009 年第 3 期,第 25—47 页;刘丰、左希迎《新古典现实主义:一个独立的研究纲领》,《外交评论》2009 年第 4 期,第 127—137 页;李巍《从体系层次到单元层次:国内政治与新古典现实主义》,《外交评论》2009 年第 5 期,第 134—150 页。

新现实主义的结构理论为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但其抽象和宏观的国际结构难以解释国家的具体行为。解释力的不足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结构现实主义不能解释结构稳定时国家采取某项具体外交政策的原因;另一方面,它无法说明不同国家对结构变化及其方向认同一致时为何会采取不同的外交政策的原因。新古典现实主义认为这种解释力不足是由两方面原因造成的:一是新现实主义认为国家具有同质性,忽略了权力之外的其他因素;二是新现实主义把国家看做是“黑箱”,只能对结构及其变化做出回应。另外,对于古典现实主义,新古典现实主义一方面肯定其对国内情况的差异性和影响外交政策的诸多国内因素的考虑,另一方面认为古典现实主义为了提高解释力需要引入国际体系因素的作用,此外还需要借助现代社会科学方法论,必须提出清晰且可检验的假设。

新古典现实主义通过明确独立的研究对象、坚持现实主义的核心理论以及建立区别于古典现实主义和新现实主义的因果逻辑,提出了自己的研究纲领。首先,新古典现实主义的研究对象是外交政策,这意味着所有影响外交政策的因素,包括体系因素和国内因素都被纳入新古典现实主义的研究视野。其次,新古典现实主义坚持现实主义的基本假定,比如国家中心论、无政府状态的不确定性和竞争性以及权力是维持国家生存的必需。^①最后,新古典现实主义在借鉴新现实主义和古典现实主义理论的基础上,提出国际结构通过影响国内约束和精英认知等干预变量作用于外交政策的制定和执行的基本理论路径。^②

在对新现实主义和古典现实主义的优缺点进行分析之后,新古典现实主义希望通过建立独立的研究纲领发扬二者的优点,弥补二者的不足。其基本理论路径是,肯定国际结构对外交政策大方向的决定性作用,但由于国内因素的影响,结构信号不能准确完整地传达至决策者或者结构本身没有给出应如何回应的确切信号,因此,要理解外交政策,必须解释哪些国内因素影响以及如何影响结构信号的传达和回应。

基于此,新古典现实主义的建构重点是结构压力、国内因素和国家行

^① Steven E. Lobell, Norrin M. Ripsman and Jeffrey W. Taliaferro, eds., *Neoclassical Realism, the State, and Foreign Policy*, p. 14.

^② Ibid., p. 20.

为三者之间的关系。在承认体系的首要因果作用的前提下,这一理论将单元层次因素重新带回到现实主义理论中,并且提升了其理论化程度。这种研究路径的转向符合20世纪90年代之后国际关系研究中研究层次回落的发展趋势,可以视为一种进步的问题转化。^①

二、从《文集》看新古典现实主义的最新进展

《新古典现实主义、国家与外交政策》一书除第一章导言和第十章结论部分涉及学理层面的探讨之外,其余各章大多是研究型论文,既有理论框架,也进行了案例研究。总体上看,这本文集从两个方面推进了新古典现实主义的研究。

首先,对新古典现实主义的核心概念和理论主张加以提炼,明确了这一理论的研究范围,厘清了与古典现实主义和结构现实主义之间的关系(见表-1)。针对一些典型的批评意见,比如存在简化主义倾向、背离了现实主义的核心逻辑,各位学者也作了回应和澄清。根据几位编者的阐述,新古典现实主义试图解释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同一国家在不同时期为何采取不同的外交政策,二是面对相同外部压力的国家为何采取不同的外交政策。这两个问题使其与结构现实主义区分开来,既不是对沃尔兹理论的重新表述,也不是在结构理论中掺杂单元层次变量来解释异常行为。^②在明确研究问题的基础上,新古典现实主义的研究议题被限定为威胁评估、政策调整以及资源汲取三类,分别涉及哪些国内政治因素决定一个国家处于威胁之中以及威胁程度大小,哪些因素在应对威胁的政策制定过程中发挥怎样的作用,哪些因素影响政策的实际执行及其效果。

^① 研究层次的转变可参见李巍、王勇《国际关系研究层次的回落》,《国际政治科学》2006年第3期,第116—118页;李巍《从体系层次到单元层次:国内政治与新古典现实主义》,第134—150页。

^② 有学者曾经批评新古典现实主义只能解释结构现实主义的反常,这一批评参见,Brian Rathbun, "A Rose by Any Other Name: Neoclassical Realism as the Logical and Necessary Extension of Structural Realism," *Security Studies*, Vol. 17, No. 2, 2008, pp. 294-321。

表-1 古典现实主义、新现实主义与新古典现实主义异同比较

研究纲领	认识论与方法论	体系观	单元观	因变量	基本因果逻辑
古典现实主义	归纳; 关于政治本质的哲学反应或详细的历史分析	比较重要	异质	国家的外交政策	权力分布或利益分布→外交政策
新现实主义	演绎; 定性与定量分析	非常重要; 内在的竞争性 和不确定性	同质	国际政治结果	相对权力分布(自变量)→国际结果(因变量)
新古典现实主义	演绎; 定性	重要; 无政府状态对决策的影响是变化的, 有时是不明确的	异质	国家的外交政策	相对权力分布(自变量)→国内约束和精英认知(干预变量)→外交政策(因变量)

来源: Steven E. Lobell, Norrin M. Ripsman and Jeffrey W. Taliaferro, eds., *Neoclassical Realism, the State, and Foreign Policy*, p. 20.

其次,将“国家”(state)作为新古典现实主义的核心理念,初步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国家理论。将国家这个“黑箱”打开是新古典现实主义与基于自由主义的国内政治理论相近之处,但如果没有一种与之相区别的国家理论,就会与自由主义趋同,从而丧失理论的独立性。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使得新古典现实主义仍能立足于现实主义阵营之内,几位编者在导言部分阐述了自己的国家理论。在他们看来,国家是自治的政治实体,有着不同的地理范围、内部属性以及在无政府环境下共存和相互作用的能力。国家主要是一个安全研究的分析性概念,与民族、社会等概念具有严格的区分,可被视为“国家安全执行者”的缩影,它包括政府首脑以及对外安全决策的部长和官员。这些执行者处在国家和国际系统的结合处,从国家政治军事部门获取信息,对体系的约束进行评估,并确定维护国家利益的最佳方式。从这一点看,新古典现实主义并不像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者那样将国家视为不同社会利益集团或经济阶层需求的简单集合,而是认为领导者在界定国家利益和执行外交政策过程中以对相对权力和对他国意图的评估为基础,但在一定程度上受制于国内约束。

由于该文集各章采用的具体理论框架、选取的案例以及研究过程存在差异,在此我们有必要简要梳理这些研究,从而具体地理解它们是如何推进新古典现实主义的研究,进而明确这些研究存在的缺陷。

该书第二、三章涉及威胁评估。洛贝尔重点关注了国内因素如何影响国家对结构信号的接收和理解。作者指出,因为物质实力分布和外交政策之间没有直接的联系和完善的信息传递纽带,^①所以由此引申出了三个问题,即国家如何评估威胁、评估过程涉及哪些国内因素、如果政治或社会的精英之间存在分歧将如何影响对威胁的评估。针对第一个问题,作者建立了一个复杂的威胁认定模型,认为国家对威胁的评估需要考虑来自体系的、地区的和国内的威胁,其中体系的和地区的威胁来自于大国,而国内威胁大多来自于可能反对现政权的民族或族群。除此之外,评估一国是否构成威胁依据的主要是内部某个部门实力的迅速增长,因为部门实力的增长会使另一国相关社会部门感到威胁。参与评估过程的主要国内要素是外交政策执行者以及认识到他国与自身相关的部门实力增长的社会精英。作者假定前者把促进国家安全状况和巩固政权作为政策制定的核心考虑,后者则重点关注增进自身利益以及压制其他竞争性的社会力量。关于外交政策执行者与相关社会精英对威胁认定的问题,作者根据对威胁认定的一致程度,划分了外交政策执行者可能面对的三种情形(几乎不受约束的情况、受部分约束的情况以及相对受约束的情况),并就每种情形分析了外交政策的制定以及随后的执行情况。

马克·布劳利(Mark R. Brawley)以二战之前法国、英国和苏联对德国威胁的评估以及各自的制衡行为为例,讨论了面对同样的威胁时,国家采取的不同制衡行为的原因。作者一方面将体系因素纳入到以国内因素为关注重点的传统研究中,另一方面将时间因素和国家将经济实力转化为军事力量的能力融入均势理论,认为国家在采取制衡行为时必定要考虑这两个因素。通过以上两个方面的理论创新,作者提供了新古典现实主义对二战前制衡行为的政治经济学解释。20世纪20年代,在德国威胁尚不明晰的情况下,法国竭力延缓德国经济复兴,推迟德国崛起的时间;英国希望德国经济恢复从而有能力支付赔款、

^① Steven E. Lobell, Norrin M. Ripsman and Jeffrey W. Taliaferro, eds., *Neoclassical Realism, the State, and Foreign Policy*, p. 44.

制衡法国;苏联则认识到可以利用德国促进自身的经济利益和工业化进程。在德国威胁日益迫近的30年代,英法均加快了将自身经济实力转化为军事力量的脚步,英国加强了空军和海军的实力,法国修筑了马其诺防线,苏联通过与德国结盟争取扩充军备的时间。由此看来,二战前夕各国在选择制衡行为时充分考虑了经济因素的重要性以及达到制衡能力所需要的时间。

该书第四至六章分析了民族认同、领导人和国内利益集团等国内因素在国家战略调整和政策选择中的作用。珍妮弗·斯特林·福尔克(Jennifer Sterling-Folker)以台海两岸的关系为例,从新古典现实主义的视角驳斥自由主义的核心主张,认为经济往来的密切和共同利益的增多不一定能够促进和平,安全竞争的情况可能持续地存在于经济上相互依赖的国家或地区之间。斯特林·福尔克的研究实际上融合了权力结构、身份认同和内部政治三种因素,认为国际结构决定着两岸关系的基调。作者对两岸关系历史进行考察后发现,海峡两岸的关系总体上反映了中美两国的结构性矛盾。从建构主义的维度出发,作者首先分析了族群身份的形成包含了对内整合和对外区分两个方面,认为内部竞争和外部刺激促进了民族身份的形成,进而影响和重塑对外政策。就国内政治而言,作者论证了美国国内持不同对华政策意见的派别间的竞争,将这一因素作为强化两岸不同的身份认同和民族主义的外部刺激。

柯林·杜埃克(Colin Dueck)着重讨论了领导人与其他国内政治要素之间的互动如何影响了对外军事干涉。作者认为,虽然国际结构决定了美国对外干涉的必然性,但仅此不足以解释实施某次具体军事干涉的原因和方式。因此,回答国内政治如何影响总统对外干涉的决定及其方式具有重要意义。首先,作者澄清了总统发动对外军事干涉并不是出于缓解国内矛盾的需要,而是需要考虑国家的安全利益以及国内因素的束缚。由于总统和其他国内要素是相互影响的,因此如果总统要实施对外军事干涉必然要最大限度地争取国内支持。随后,作者通过分析朝鲜战争、越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论证在相对实力决定美国必然发动三次战争的情况下,国内因素是如何影响总统进而决定战争方式和进程的。这些国内因素包括民意、国会、利益集团、官员对威胁的感知以及党派之争。总体而言,文章考察了对外军事干涉的国内约束及其对领导人的影响,但正因为其试图涵盖所有可能发挥作用的国内因素,所以没有明确哪些国内因素

如何影响对外干涉行为的具体原因和方式,因而没能有突出核心的因果链条,这可从作者仓促设计的模型中略见一斑。这篇文章虽然提出了一个非常有意义的问题,但无论是其模型还是案例均没有给出一个明确有力的回答。

里普斯曼试图回答国内因素在何种情况下影响对外安全政策以及哪些国内利益集团在这一过程中起的作用最为显著。作者认为,因对结构信号和自身执政地位更为敏感,对外安全政策的决策者是相对独立于社会的,国内政治中对安全政策影响力最大的是利益集团。在回顾新现实主义理论和国内政治理论的基础上,作者对新古典现实主义的主张进行了宏观的阐述。之后,在五个问题的引导下,作者得出了目标问题的具体回答,即在安全相对充裕的国际环境中以及在决策部门独立性强的国内政治环境中,利益集团能够发挥相对较大的作用,而且这些作用往往体现在改变政策出台的时间、执行方式或力度上,一般情况下不能左右政策的推行与否;反之,利益集团发挥的作用较小。这是一篇纯理论建构的文章,作者试图找到利益集团发挥影响政策作用的一般规律。值得肯定的是,文章论述的结构比较清晰,而且与前面几章相比它避免了对案例的依附,即不是针对某个案例“量身定做”的理论或模型。但是,建立普遍理论的尝试一般难以避免得出常识性的结论,如果新古典现实主义者希望创建独立且有竞争力的外交政策理论,仅仅停留在类似本文的结论上似乎不足以实现这一目标。

该书第七和第八章探讨了国家进行国内资源汲取和动员的能力。托利弗重点关注国家发展的问题,即在何种国际环境和国内情况下,国家能成功地模仿先进国家或者创造新发展模式。作者认为,新现实主义没有解决这个问题是因为它假定国家拥有无限制的国内动员能力。实际上,由于各国的制度、民族主义和反政府意识形态的发展情况存在差异,各国的动员能力是不同的。通过观察,作者认为在外部威胁大、国家动员能力强的情况下,国家倾向于采取模仿的发展模式;反之,如果国内动员能力差,国家往往模仿失败。在外部威胁小、国内动员能力强的情况下,国家易于开创新的发展模式;反之,动员能力差的话,国家则既没有创新也没有模仿的动力和紧迫感。在此,作者着重讨论了意识形态和民族主义在政府动员国内资源时所起的作用。

施韦勒的研究延续了对意识形态的关注。作者从观察现象出发认为,国家

并不像进攻性现实主义者所描绘的那样一直在伺机扩张,而是随着大众政治时代的来临,国家的扩张行为越来越少。因为现代国家的民众广泛地参与了政治生活,所以扩张政策必须得到民众的支持,其中最重要的是民众愿意为之做出自我牺牲。这就需要国家主导的意识形态能唤起民众的民族主义。最典型的例子是法西斯主义,它源自现实主义的哲学基础,即悲观的、愤世嫉俗的世界观。^①但现实主义本身没有提供政策建议,企图扩张的现代国家通过推行法西斯主义,描绘并使民众相信他们身处于一个极端危险的世界。

总体来看,《新古典现实主义、国家和外交政策》对结构信号如何通过国内因素传导至外交政策的制定和执行进行了尝试性的回答,其中威胁评估和政策调整这两类文章反应了结构信号的两种间接作用。几位作者通过提出影响外交政策的若干国内因素以及说明它们的影响机制,力图完善和拓展新古典现实主义的理论模型。许多作者通过列举具体案例来说明,单单考虑结构不足以解释某项外交政策的出台和执行,必须引入国内某个或某几个干预变量才能加以充分说明。部分作者更通过案例研究,详细地考察了这些干预变量发挥作用的机制,认为政策决策部门与社会是相对独立而又不是完全独立的,其他国内因素对外交政策所起到的影响也不完全是独立于结构的。总之,该书中的各位学者对影响结构压力作用的政府动员资源的能力、经济实力转化为军事力量的时间和能力、民族认同、精英的认知、利益集团、领导人的个人偏好等国内因素做出了理论建构,并进行了案例考察。

三、新古典现实主义的困境与出路

虽然《文集》中的每篇文章试图从不同角度来深化和推进新古典现实主义理论,但这些文章综合起来也反映出这一理论存在着明显不足。在笔者看来,新古典现实主义的困境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

第一,缺乏核心概念和核心理论,导致新古典现实主义成为一个松散的阵营。从目前大量相关研究来看,包括《文集》中各章经验研究也突出地表明,新

^① Steven E. Lobell, Norrin M. Ripsman and Jeffrey W. Taliaferro, eds., *Neoclassical Realism, the State, and Foreign Policy*, p. 248.

古典现实主义学者建立了太多的分析模型,而这些分析模型之间缺乏统一性。尽管这本文集力图形成一种与其他理论相区别的国家理论,并以此作为新古典现实主义构建统一分析框架的基点,但仍然无法改变阵营内部缺乏凝聚力和整合性的缺陷。^①之所以存在这种困境,主要是因为影响一国外交政策的国内因素过于庞杂,不同的学者在变量选取上有个人的偏好,以至于领导人的认知、国家能力、意识形态等因素都被纳入进来。只有当阵营内部的各位学者使用统一的核心变量进行研究,或至少明确他们使用的不同变量能够整合到一个分析框架中,新古典现实主义才可能成为一个研究纲领。

第二,新古典现实主义认为结构因素对外交政策起主导作用,但他们并没有将这一观点反映在文集中。由于每篇文章的核心案例具有明显的选择性和特殊性,作者往往为了将某个或某几个国内因素的作用充分展开,就通过案例的选择来控制结构诱因。这类文章采用将结构诱因与国内因素分离开来的研究方法,有利于将国内因素的作用独立出来,突出新古典现实主义的国内政治模型,但将国际结构变量控制后对其则不再讨论,只专注于国内变量的操作使新古典现实主义更像是国内政治理论。正如一些研究者所指出的,结构层次变量仅仅作为背景性因素来考察,并没有实现真正的跨层次分析。^②因此,新古典现实主义对于如何在案例中既突出结构的主导作用又体现国内因素的具体影响,尚需要进一步的明晰。

第三,在处理结构与单元之间的关系上,文集的作者没有达成一致,而是模糊地认为二者相互影响,即结构和单元因素都不是完全独立的。比如,洛贝尔强调了国家内部某个部门实力的增长是结构变化的重要因素,承认单元内的变化导致结构变化的可能性。而斯特林·福尔克讨论了中美结构性矛盾通过美国、大陆和台湾内部政治体系的“过滤”作用于三方的政策选择,认为结构因素影响单元内部政治来影响外交政策的制定和执行。尽管强调结构地位的优先性和单元因素的必要性,文集中体现的以上两点不足表明,新古典现实主义仍没有明确结构和单元在其理论中的位置。只有很好地处理跨层次研究的问题,

^① 对新古典现实主义缺少核心概念和核心理论的批评也可参见,刘丰、左希迎《新古典现实主义:一个独立的研究纲领?》,第137页;Shiping Tang,“Taking Stock of Neoclassical Realism,”*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Vol. 11, No. 4, 2009, p. 800。

^② 刘丰、左希迎《新古典现实主义:一个独立的研究纲领?》,第137页。

新古典现实主义对新现实主义与古典现实主义不足的弥补才能名副其实。

第四,除了没能厘清结构与单元的相对位置,新古典现实主义在国内因素模型的设计和国内因素的操作上尚不成熟。许多新古典学者往往通过具体案例发现某个或某几个因素对外交政策产生影响,并就其影响的因果链条设计所谓的模型。但他们既没有对模型的适用范围作出相应的说明,有时甚至对模型本身的解释也不够充分。实际上,在多数情况下这样的模型难以应用于除作者提供的案例之外的情境,即便可以应用也存在解释力不足的缺陷。采取这种就事论事的解释方式,使得现阶段的新古典现实主义成为只是将体系与单元层次糅合起来的分析视角,难以称之为具备独立研究纲领的理论。对于一个理论流派的建立和完善来说,不仅需要明确的概念和概念之间的逻辑关系,更需要划定适用范围,使其在该范围内具有普遍意义,而不是依附案例而存在。在对国内因素的操作上,新古典现实主义在论述某个具体国内要素时,难以做到排除其他要素的影响。政府的国内动员能力在与某种激进的意识形态相关的同时,可能也与领导人的手段以及国内政治体制等因素密切相关。新古典现实主义者可以突出某个国内因素的影响机制,但难以对其程度和范围进行进一步地衡量。

总体来看,新古典现实主义理论的严密性还有待提高,只有进一步做到真正厘清体系因素与单元层次之间的关系,并阐明这两个因素在具体案例中发生变化时的作用方向,才能称得上是一种逻辑严谨的跨层次理论。

四、结 语

《文集》汇集了新古典现实主义阵营中一批主要学者的研究,它以国家为核心概念,探讨了国家的内在属性和特征为何、如何以及在何种条件下介入到领导人对外部威胁和机遇的评估中,从而影响他们可能采取的外交、军事和对外经济政策。尽管书中各位学者研究的具体案例各不相同,而且也试图提出不同的研究框架来加以解释,但仍力图将新古典现实主义确立为一个具有内部凝聚力的研究纲领。作为第一部系统阐述和评估新古典现实主义的理论主张的著作,此书的出版有助于丰富我们理解国家如何评估和应对国际和国内层次的

安全威胁,同时也有助于我们理解新古典现实主义与其他理论流派之间的区别。

目前,国内学界对新古典现实主义理论多有评介,但不无遗憾的是,中国学者还没有将这一理论运用于对经验现象的解释,也没有将其付诸经验检验。理论只有与经验结合才能证明其解释力,也必须与经验结合才能推动我们对现实的认识。《文集》中的多篇论文展现了如何将新古典现实主义运用于国际关系现实案例中,或许可以为中国学者今后的经验研究提供范本,利用中国的历史和现实经验丰富和完善这一理论。

作者简介

巴里·布赞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蒙塔古·伯顿教授,哥本哈根大学和吉林大学名誉教授。

电子信箱: b.gbuzan@lse.ac.uk

张 锋 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讲师。2004 和 2009 年在伦敦经济政治学院分别获比较政治学硕士和国际关系学博士学位。曾任《环球时报》国际论坛版编辑。研究兴趣为国际关系历史与理论。

电子信箱: fengzhangmc@gmail.com

陈 冲 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国际关系学系 2006 级本科生。

电子信箱: nkchenchong@hotmail.com

刘 丰 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讲师。2004、2006 和 2009 年在南开大学分别获法学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译著有《亚洲金融危机的政治经济学》(2009 年)。

电子邮箱: liufeng00@gmail.com

王树春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国际政治系教授。1999 和 2002 年在中国人民大学分别获法学硕士和博士学位。著有《转型时期的俄罗斯国家安全战略》(2002 年)、《经济外交与中俄关系》(2007 年)等。

电子信箱: wangshuchunf209@163.com

朱 震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国际关系专业硕士研究生。

电子信箱: 492765184@qq.com

吴文兵 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博士候选人。1999 年在电子科技大学获机械电子工程专业学士学位 2007 年在新疆大学获国际政治专业硕士学位。

电子邮箱: wuwb07@mails.tsinghua.edu.cn

刘若楠 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国际关系学系 2009 级硕士生。2009 年在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系获法学学士学位。

电子信箱: liuruonan.crystal@gmail.com